

收稿日期:2024-03-10

晚明泰州学派“王氏三贤”诗歌简论

张泽如¹, 钱成^{2,3}

(1.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0;

2. 泰州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3. 南京大学泰州学派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04)

摘要:作为晚明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泰州学派促进了平民儒学化思潮在晚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形成、流行和发展。王艮、王栋和王骥,是泰州学派的创立者和杰出代表人物,素有“淮南王氏三贤”之称。“王氏三贤”的诗歌从百姓生存需要、物质需求和情感渴望入手,面向民众并敦化民俗,是社会转型期主动推动文化发展的范例。他们的艺文实践表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其中蕴含的泰州义理为晚明通俗文艺思潮提供了思想空间。“王氏三贤”诗歌的发展脉络,深刻展示了“淮南心学”与文学如何一步步走向协调统一的过程。

关键词:泰州学派;王氏三贤;平民儒学;诗歌;泰州义理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873(2024)05-0111-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代扬州家族文学研究”(23YJA751013)。

作者简介:张泽如(2000—),男,江苏南京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钱成(1977—),男,江苏泰州人,泰州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泰州学派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

DOI: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5.068

明代后期的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泰州学派之前,身兼学者、士大夫等身份的王阳明和其他明代理学家,觉得以天下为己任是自身之职,反对一般民众有担当天下的胸怀。而与他们不同的是,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大多是未出仕只在地方活动的“阳明后学”,或只有较低的功名、或是平民,泰州学派的讲学对象大多是普通百姓,话语也是非官方、非中心、非主流、非精英、非正统理学的民间话语,与士大夫的王学话语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泰州学派促进了当时的民间儒学形态的形成。

泰州学派重视人皆平等的天性,反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虽然泰州学派没有关于文艺的直接论述,但“人”的解放必然引起“文”的新变。创始人王艮及其家族成员的创作实践,不仅传播了泰州学派思想,反映了泰州学派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而且体现出泰州学派思想对明代后期诗文创作美学风格的影响。

近年以来,张岂之、陈来、陈良运、周群等学界前辈对泰州学派“平民儒学观”的思想和美学意

义表示了肯定。张岂之先生更是在首届江南文脉论坛开幕式上强调:“在江苏文脉整理和研究工程中,要重视泰州学派的学术研究。”^[1]目前,学界对“泰州学派与文学研究”的关注仍集中在李贽、汤显祖、冯梦龙等泰州学派后学的身上,而对泰州学派核心代表人物的诗文歌赋等正统文学体裁的关注不够,相关研究不如戏曲和小说。拙文拟通过对王艮、王栋和王襞的诗歌分析,探究这三位被主流文学史忽视的泰州学派前期成员在会通心学义理与文学方面的贡献。

一、王艮借韵文说泰州义理

王艮,原名银,后王阳明易其名为良,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世代为盐业灶丁。他深知盐业灶丁和社会底层人民的疾苦,这为他日后论及“百姓日用是道”埋下伏笔。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启蒙运动和通俗文艺思潮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王艮主张将儒学经典从书本和经学的案头中解放出来,通过百姓易于知晓的形式,使儒学思想内化入百姓精神,从而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殷殷布道和谆谆教诲的气质自然而然地体现在王艮的诗歌之中。

王士炜《心斋先生学谱》整理的王艮十四个学说中,其诗歌体现得最为显著的当属“百姓日用即道”与“良知为自然天则”这两大学说^[2]。王艮将“百姓日用”作为判断“圣人之道”的标准,正如《王心斋先生年谱》云:“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3]由此可见,泰州学派创立之初,在传教证道方面是以启发民众自觉为旨归。作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在艺文中融入了有极强现实指向性的泰州义理,借助韵文将人生道理传达给普罗大众。现存王艮的16题25首诗歌中,绝大部分是赠答之作,主要有:五绝如《题淳朴卷》《示学者》等;七绝如《勉学者》《天下江山一览诗六首觉友人》等;七言律诗如《和万鹿园诗》《送友人》等;五言排律,如《送胡尚宾归省》与《书荷轩卷》。

单从诗题来看,便能发现,王艮诗中常出现“示”“勉”“觉”等含有启示勉励的字眼和“正身”“孝弟”“修身”“诚心”等富含哲理意味的词语。“道”“良知”和“心”这样的心学概念也在其诗中以较高的频率出现。如《示学者》:

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乐。有事行无事,多事亦不错。能无为兮无弗为,能无知兮无弗知。知此道兮谁弗为,为此道兮谁复知?^[4]

语言浅显易懂,诗句中多次出现的文言助词“兮”字在加强节奏、增强咏叹之感的同时,也易于学者传诵学习,这非常符合王艮作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致力于通过通俗的语言将儒学思想传递给平民百姓的习惯。

讲说义理,是王艮常用的使民众信服的手段,为了阐发泰州心学,王艮的诗歌体现出一条复杂且通贯的证道之路。《示学者》《勉友人处困》《勉学者》《次先师答人问良知》《天下江山一览诗六首觉友人》《次答友人》诸诗,诗题就有着浓厚的说理劝勉气息。就诗歌内容而言,说理气息在他的诗歌阐发“良知说”时较为明显。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根基便是“良知说”。王艮云:“故道也者,性也,天德良知也,不可须臾离也。率此良知,乐与人同,便是充拓得开。”^[4]对“良知”深刻复杂的定义,王艮诗作中的阐述和论证方式如“至易而至简,至近至神焉”(《送胡尚宾归省》)一样,他在《次先师答人问良知》诗中提到:“知得良知却是谁,良知原有不须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没有良知之外知。”^[4]“良知”一词在诗题和诗句中随处可见,正是这样的诗歌形式,承载了王艮对“良知”的阐释,即“良知”源于自然,摒弃一切人为安排,因此是“不须知”的。短短一首七言绝句,便将其“良知为自然天则”的思想界定清楚。围绕“良知”,王艮认为“良知”是人所原有——“此乐多言无处寻,原来还在自家心”(《和王寻乐韵》),且“知性即知天”(《送胡尚宾归省》),“都道苍苍者是天,岂知天只在身边”,“良知”就在众人触手可及处。“果能会得如斯语,无处无时不是

天”(《天下江山一览诗六首觉友人》其一《咏天》),究其源头,就在于“天命是人心,万古不易兹”(《和万鹿园诗》),对此,王艮总结出了“能无为兮无弗为,能无知兮无弗知。知此道兮谁弗为,为此道兮谁复知”的论断,再通过诸多论及“良知”的诗歌后,他顺畅地将“良知”引入了“至易而至简,至近至神焉”的心学范畴当中。获得了“良知”也就是“意诚心正身修”后,就可以“天地参同贯古今”(《和王寻乐韵》),达到“至神焉”的境界。

王艮融泰州义理入诗歌,将心学主张传递给百姓大众,其诗歌中不仅体现出对心学之理的遵守,也表现出贴近百姓日用的民间情怀。

二、王栋通义理且有意以审美点化之

王栋,字隆吉,号一庵,是王艮的族弟,早年跟随王艮学习。王栋作为王氏家族中仅有的入仕之学者,有在白鹿洞会和南昌正学书院的主持经历,这就使得他在涉及学理道义的阐发上,较王艮有着更加严密的逻辑和细致的讲解。当时,心斋之学与阳明之学在“格物”的阐发上有所出入,王栋能持守王艮学说,他的学说“近炙安丰,远溯姚江”^[5]。王栋在加强王艮与王阳明学术联系的同时,也提高了王艮的学术地位,“发明翁之蕴,教万世无穷,我先师之功不大矣哉”^[5]。可以说,王栋在贯通阳明之学和心斋之学上做出了卓著的理论贡献。王栋著有诗集《论学杂吟》,现存诗歌17题28首,绝大部分为七言律诗。与王艮类似,王栋诗歌的哲理意味也同样浓厚。从诗歌题目来看,他的《示讲堂诸生》《乡约谕俗诗六首》等,出现了“示”“谕”等启示字眼。

王艮诗的说理总在“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6]710},说理的严密疏证并不是其强项。王栋诗在保留与王艮同样浓厚哲理气息的同时,还有较为严密的论证,此外,王栋诗还体现出文人的从容与风雅。

他的诗集《论学杂吟》,所“吟”即诗歌,他是因论学需要作诗。论学是作诗的目的,作诗是论学的手段,这是“王氏三贤”诗歌的共同特征。王栋和王骥在诗歌中能以审美的形式传达其思想。对“百姓日用即道”这样的思想更能以诗的语言点化。

王栋认为“莫把词章拱众乐,须将道义结同盟”(《朋来亭和韵三首》),“道义”应该被摆在和“词章”同等的地位上,甚至比诗歌的词章形式更为重要。纵观王栋的诗歌作品,“乐学”和“乐”的主张被多次提到,仅在《寻乐吟四首念同志》一诗中,就出现了八个“乐”字。王栋“学不离乐”,“乐学”的教育主张使得“乐”一词在其诗歌中有了最高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他诗题中的其他字眼。

在泰州学派中,“乐学说”最先由王艮提出,其《乐学歌》中是这样解释的: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5]

王艮继承了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以说乎”的传统,但更近一步强调“不乐不是学”和“不学不是乐”,看似王艮花了大量篇幅是在阐述“乐学说”的主张,实则可以用“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一句来概括《乐学歌》全篇,即“乐”即是“学”、“学”即是“乐”。《乐学歌》满足了“百姓日用”的需要,让百姓在广为传诵的过程中吸取了“乐学”的主张,但是其逻辑不足,缺少了稳扎稳打的推理过程。因此,“乐学说”还有待进一步的丰富和提升。

王栋在《寻乐吟四首念同志》一诗中,实现了“乐学说”的升华,并以“乐学说”为基础成一家之言。一方面,王栋继承了古代儒家的学习理念(“人言寻乐要寻真,试把真寻看古人”),“古人之乐”在这首诗前半部分已有提及,“孔颜真乐不难寻,寻动天然乐在心”,在提到“古人之乐”时又引出了“天然之乐”的概念,要“打起精神认本体,放开怀抱即灵襟”,其中“本体”即“乐”。另一方面,王栋又继承了王艮“乐学说”的泰州学派乐学传统(“真乐原从乐处生,大家同乐共薰成”),面对社会基层民众,以百姓日常生活中直接受用的人生道理为要,而不是围绕“乐学”一词作纸上空谈,

这在他另一首诗《别家乡诸友叠前韵》里的“认得反身真乐处,会于日用各安然”一句也有体现。在“大家同乐共薰成之后”,王栋“偷闲讵敢笑程兄”,又提到“分明入圣超凡路”,与本首诗其一句“圣功多少堪拈出”都提到了理想境界的“圣”,王栋对“圣”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此意如何最要明”),随即又指出“一点灵机从此发,万般妙用此中生”。“乐”是产生“灵机”与“妙用”的源头,是达到“圣”的理想境界的必要条件。就这样,王栋将“乐学”所继承的两个方面实现了融通,他把“乐”看成是人的心之本体,把追求并实现理想状态的远大志向看作是乐的根源。

细化到具体的“乐”和“学”的关系上,一方面他认为搞好学习首要是身心俱泰,以乐为学,做到“平生不解皱眉头,一乐能消百欲愁”(《和答董落山二手其一》),另一方面他提出了“学不离乐”说。王栋的学不离乐,既是一种态度要求,也是一种方法和精神要求。“但将乐学时时耳,自有生机勃勃然。”这样一来,王栋在诗中便完成了对王艮“乐学说”体系的扩充和提升。

王栋的记游诗能体现出他所具有的超然物外情怀和通脱自由之志。如在《月夜泛盱江弹琴舟中》诗中所写的江上月圆之夜独乐:

水满江千月满天,短篷轻下思怡然。
光涵一色明如昼,云敛千峰静似禅。
得意解琴渐独乐,怀人欹枕意忘眠。^[5]

王栋在赏景怡乐之余,能细笔描刻出自然风景。如在《李一吾公邀饮水竹居二首》之二所写的“赋诗随酒看源头,漫兴休教花鸟休”句,“漫兴”即悠闲自得的雅兴,兴至于此,有自得之乐。

王栋有诗云:

古乐不传,乐无可习者,独诗歌一事,乃遗其意,学者诚不可以一日不诗歌也。^[5]

这表明他极其重视诗与乐的审美功能。王栋《示讲堂诸生》诗云:

讲堂游侣发歌声,天籁无端日夜鸣。
真乐得来非色象,良知悟破自空明。
见闻情识休相混,势和纷华岂足撻?
这是乾坤真诀窍,敢矜私秘说师承。^[5]

诗人将“真乐”和“良知”两个义理用诗歌的形式化出,将“百姓日用”和“诗酒风流”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了通脱的境界,摆脱了枯燥的学理说教,为泰州学派思想加入了通脱风流的审美价值。

三、王襞会通义理与艺文

王襞,字宗顺,号东厓,晚号天南逸叟,王艮次子。早年随王艮执贽于阳明门下,深受阳明和阳明弟子濡染。作为王艮次子,王襞弘传王艮学术之功卓著,其兼综泰州、龙溪的为学经历及文道兼擅的为学特色使其在泰州学派中具有独特地位。

《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收录王襞诗歌共 126 题 196 首。其中七律诗 107 首,占大部分,次为七绝,计 57 首,另有少量五律、五绝、排律及杂言体。王襞的诗作与王艮、王栋的有着明显的区别,他的诗作内容甚广,有寄赠,有步和,有感兴,有优游登临,更有《咏菊八首》等典型的文人咏物诗,多为抒写一己襟怀之作,这在泰州学派中颇为独特。陈田《明诗纪事》云:“东厓诗宗《击壤》。”^[6]显然,王襞是泰州学派“王氏三贤”乃至泰州学派前期学者中,诗歌成就最高的一位。如果说王艮是以通俗易懂乃至浅俗的韵文表达思想,那么王襞则常常以审美而非纯粹的义理分疏的形式表达了泰州学派的思想。王襞曾自谦道:“老将至矣,而弩钝如初,读书未谙义理,文艺全不晓通,徒以涇涇之迹冒虚声于乡里。”^[7]可见,精义理而通艺文实乃王襞的人生期许。

在他的诗歌当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为理造诗的甚而纯粹说理诗的情况。如《粘壁间自勉》:

纤毫不敢欺天地,跬步须知有鬼神。
希圣希贤先辨志,一言一动必归真。^[7]

其阐述“修道之谓教”主张的意图明显,此“道”即圣人之道,修道的目的是“归真”。

王襞之所以是“淮南王氏三贤”诗歌成就最高者,除了他在义理和艺术中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平衡点以外,还在于王襞的文人诗创作成就较高。黄宗羲评王襞:“未免犹在光景作活计。”^{[8]1720}虽是对其“曾点气象”流入狂放的批评之语,但从另一个维度体现了王襞注重审美形象的特征。

以其诗《中秋》为例:

九秋清气属平分,况复凉风净扫云。
万里辉光呈瑞象,一天华彩避星文。
蟾宫恍见嫦娥舞,桂影遥传帝乐闻。
更有一般齐盛处,满空花雨落缤纷。^[7]

全诗不见一点说理的痕迹,是一首纯正的文人诗。这首诗描绘了中秋前后,秋高气爽的氛围。开场就展现出宏大气象,艺术上属对精工,化用嫦娥、蟾宫的典故,“满空花雨落缤纷”一句更是点睛之笔,诗人喜胜之情溢于言表,性灵见于笔端。王襞对诗歌审美形象性的关注,较王艮与王栋有了很大的进步,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论王襞之诗:“‘一室香消雨,三更月到窗’,‘好雨应宜早,秋花不恨迟’,‘坐雨新亭晓,闻潮落月时’,‘老携杖屦归山谷,闲看儿孙种水田’,亦有活脱之趣。”^{[9]425}“活”是对王襞以艺术实践见长的肯定,表明他作诗已始有意为之,不再单纯为了讲说义理。

诗歌是个体生命情感与社会生活的交融统一。王襞有云:

性之灵明日良知。良知自能应感,自能约心思而酬酢万变。^[7]

又云:

良知本性,天之灵而粹精之体也。谁其弗具?谁其弗神?^[7]

王襞诗所展现出的生命情感体验,来源于其良知体用的系统,良知是不着人力的自然发用过程,没有外在的制约和归属,因此才能表达对生命的感悟。

得益于对艺术实践的娴熟和对生命情感的感悟,王襞的诗是明代理学家中少有受到称赞的。其诗《自留都归维扬》,先是以“笑余两鬓老江湖”自嘲,接着表明自己此次远走是“为觅英贤求与友,因寻山水却成迂”。随后记叙“晓离云郭歌先发,晚泊河桥酒慢沽”。最后发出了“雨栉风餐乃常事”的感慨,又说“几时牢落费支吾”,豪情壮志之情溢于纸表。再如《青蒲道中作》:

芦荻洲前一叶舟,来来往往越春秋。
乘风疾似云中鹤,浮月虚如天上楼。
近每东吴歌酒转,昔曾南粤看山留。
何时酬罢周游兴,老缆高维碧海头。^[7]

诗人在青蒲道上目睹来来往往几度春秋的小舟,像云中的仙鹤一样疾行,水中的月亮就像仙宫楼阁一样虚幻,此情此景让诗人想起了自己从东吴一路歌酒到南粤的经历,生发在碧海上周游的念头,表现出文士潇洒超脱的心态。

就诗歌内容而言,文人诗歌意象的大量出现绝对是有生命情感体验阐发的信号,如王襞咏物诗《咏菊八首》,围绕“菊花”这一意象,将“问菊”“植菊”“赏菊”“对菊”“评菊”“移菊”“惜菊”“忆菊”

组成一个抒发人格之高尚的有机整体。王襞也借菊自比陶渊明,来象征自己高洁的人格。王襞的生命情感体验是无目的的,生发于无意识之中。为了向深处探索这种情感体验,王襞只能进行自我剖析,以《答以中别居之作》为例:

瘦骨先生耸两肩,不将寒相着人怜。
 虽于尘俗全无气,恐与神仙夙有缘。
 每对宾朋林下坐,岂曾酒盏手中寒。
 消磨世界如流水。还我青山不改迁。^[7]

本诗是王襞自画像,王襞在无意识状态下,通过对本体的观照,回到了“良知现成”所要求的回归本体真心的境界,在世界如流水般变化中,自己能像“巍然不动”的青山一样保持初心本色。

从王襞的其他诗中,我们能发现他作为生命个体在体会生命情感中得到升华的过程,往往就是在对生死的感悟当中实现升华。如其《忆母》一诗:

此生非母何从有,鞠育恩深图报难。
 天地可穷恩可断,江河流竭泪流干。
 长成颇识趋庭训,奉养聊堪侍寝安。
 三十余年悲梦想,满头霜雪慕慈颜。^[7]

王襞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母亲无私赠与,自己对母亲的“鞠育深恩”铭记在心,只可惜想要报恩已经是难如所愿了。这样的母与子的恩情放在天地万物之间也是可歌可泣的,回想起小时候的记忆,自己即使已经“满头霜雪”,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母亲慈祥的脸庞。就在过去和现在、生与死的俯仰之间,王襞使得“母爱”这一主题在诗中得到了展现,对人的自然情性展开了体认。

四、“王氏三贤”开泰州学派由理入情之端

注重敦化民俗、面向民众,是泰州学派为学的重要特征。泰州学派以觉民为目的,从而采取了较为独特的证道方式。黄宗羲云:“阳明而下,以辩才推龙溪,然有信不信。唯先生(王艮)于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谓‘百姓日用即道’。”^{[8][710]}由此可见,泰州学派之所以能在当时产生显著的影响,与其独特的启蒙方式脱不开关系,其带有浓厚平民色彩的心学义理和与民众亲近的关系奠定了“王氏三贤”诗歌以理入诗和以学觉民的传统。

泰州学派强烈的淑世情怀注定了他们是一个注重实用、践行的学术流派。泰州学派的论学有着极强的现实指向性,讲道论学往往是因现实生活触机而发。王栋有言:“天生我先师,崛起海滨,慨然独悟,直起孔孟,直指人心。然后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不假闻见,不烦口耳。”^[5]泰州学派注重庶民教育,这与统治者教化民众的为政目标高度契合。以基层教育为例,明代初年,朱元璋令户部颁布《教民榜文》,其中六条圣谕为:“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10][728]}王栋作有《乡约俗诗六首》《乡约六歌》等,以诗歌的形式对朱元璋“圣谕六条”进行诠释。接着,泰州后学颜山农作《箴言六首》,自注为“阐发圣谕六条”,每条后又分别赋诗两首,通过万物一体和天道人性的角度,援据孟子等论述,使原本作为外在规约的圣谕,通过通俗的艺术文化为人们道德实践的内在自觉。

就数量言,王艮和王栋的诗歌数量都不超过三十首,与他们的其他文体创作相比,数量较少。王襞的诗歌创作数量却远远超过王艮和王栋诗歌创作数量的总和,接近两百首。

从诗歌题材来看,王艮诗歌以赠答和韵次韵为主,多以说理为目的,写景诗较少。王栋诗中,说理诗占有很大一部分,记游诗也占相当一部分,抒情较为受限,还未能摆脱说理。王襞诗歌题材较为丰富,除了赠答唱和的说理诗之外,出现许多纯正的抒情言志之作,不再局限于纯说理和

借景说理,而是生发自己对宇宙人生万物的感慨,更有文人诗本色。悼亡诗和偶成之作也在其诗集当中出现。也有单纯的咏物诗,表现自身的文人意趣。

从审美艺术来说,自王艮到王栋再到王襞,诗歌艺术逐渐向文人诗靠拢,从王栋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对艺文的关注,再到王襞已经能熟练运用文人诗的诗歌艺术进行创作,并获得名家的肯定。具体而言,王艮的诗歌晓畅易懂,除了遵循格律外,对诗歌艺术没有过多的关注,其诗更像是有韵文特色的语录说教。王栋的诗能够将富有哲理意味的心学术语,化用意象而出,使其所传达的哲理易于民众理解接受,且逻辑更加规整严密,诗歌艺术和哲理的结合使得“理趣”慢慢浮现。王襞诗歌能够熟练运用文人诗的艺术手法,意象和艺文语言的熟练运用,使得他的诗不管是借景抒情还是以理入情,都能达到很好的效果。王襞的说理诗较王艮有着很大的进步。总而言之,王艮诗歌主理;王栋在主理的基础上开始着意审美,在对外在世界的描摹当中阐发义理;王襞诗情理交融,义理与审美相协调,且能够通过文人诗进行自我情感的抒发,有自己的诗歌本色。泰州之学传至王襞,已具备情性观的审美理论初形,王襞用诗歌的语言谈论义理,阐发万物欲望之合理,为泰州后学宣传情性思想留出了空间:

乌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餐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充拓得开,则天地变化,草木蕃殖,充拓不去,则天地闭,闲人隐。^[7]

将王襞奉为“贄之师”的李贽在此基础上继续强调:“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乱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1]98}从自然天理的角度肯定了以自然抒发为特点的情性观,反对受外在束缚的个性意识。

借“光景”以明理的论学方式是“淮南三王”错综儒林和文苑的重要实践,其本意是让普通民众通过形象的语言,方便通晓泰州义理。王栋和王襞的创作实践则试着将义理与诗情相结合,在追求个体审美意识的同时,也对自然情性展开了体认。于论学,达到了“春风化雨”的效果。在文学上,则为通俗文艺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准备。“情性观”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和泰州之风行的风行,以李贽、汤显祖和袁宏道为代表的作家掀起了一场倡童心、表真情、抒性灵的通俗文艺思潮。

五、结语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中云:“泰州之后,遂非复名教所能羁络矣。”^{[8]703}他认为,泰州学派在发展过程当中已经脱离了名教的束缚。泰州学派思想加剧了当时下层人民对社会主流思想和秩序的反抗意识。

实际上,黄宗羲所言“泰州之后”是当时被认为“异端”的颜山农、何心隐一派,并非指泰州学派全体。之所以用“非复名教所能羁络矣”来形容,就在于颜山农、何心隐,包括受到泰州学派学说影响的李贽、汤显祖、冯梦龙等人,掀起了一场不同于正统诗文的通俗文艺思潮。以世俗化内容和通俗化形式见长的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自中晚明以降蔚然盛行,自此开始冲击文坛上以程朱理学“以雅为美”的审美观念,使得晚明文学一改受限的文学创作面貌,呈现出更加自由的创作风气。

综上所述,“王氏三贤”游动于儒林和文苑之间的诗歌创作实践,对晚明时期风行天下的“泰州学派”平民儒学思想和情性思想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钱成.论泰州学派“平民儒学观”对通俗文艺思潮之影响[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2):76-85.

- [2] 王艮. 王心斋全集[M]. 陈祝生,编.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 [3] 王艮. 王心斋先生全集[M]. 袁承业,编. 民国元年(1912)铅印本.
- [4] 王艮. 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M].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刻本.
- [5] 王栋. 一庵王先生遗集[M]. 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九年钞本.
- [6] 陈田. 明诗纪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7] 王襞. 新镌刻东厓王先生遗集[M]. 明万历刻明崇祯至清嘉庆递修本.
- [8] 黄宗羲. 明儒学案[M]. 沈芝盈,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9] 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M]. 黄君坦,点校.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10] 皇明制书;第二册[M]. 杨一凡,点校.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11] 李贽. 焚书续焚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On the Poetry of the “Three Wangs” of the Taizhou School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ZHANG Zeru¹, QIAN Cheng^{2,3}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0,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Jiangsu, 225300, China;

3. Research Center of Taizhou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4, China)

Abstract: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ol of though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aizhou Schoo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popularization i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ields of at that time. Wang Gen, Wang Dong, and Wang Bi are the founders and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aizhou School, acclaimed as the “three sages of the Wang family in Huainan”. The three Wangs express their concern for people’s livelihood, material and spiritual needs in their poetry, sympathizing with the common people and exerting a subtle influence on their character with Confucian demeanor and ideology, as role models for promot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ir poetry represents a unique aesthetic style, and the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of Taizhou school contained therein lay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popular literary and artistic trend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evolution of their poetry exemplifies the combination of Huannan school’s philosophy of mind and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 Taizhou school; three sages of the Wang family; plebeian Confucianism; poetry; Taizhou school’s philosophical doctrine

〔责任编辑:王建霞〕